

文化与历史的迷思

当代文史观个案述评

华
今
著

言论自由会淘汰精英吗？

作家为什么会失去原创力？

文化遗产怎能以文化偶像来传承

奸雄史观可以休矣

狷介之士绝非混蛋

漓江出版社

华
今
著

文化与历史的迷思

当代文史观个案述评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历史的迷思：当代文史观个案述评/华今 著；一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407-7757-9

I. ①文… II. ①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3486 号

责任编辑：吴云芳

封面设计：何 萌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8.375 字数：150 千字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前 言

“名家(文人)现象学”——王朔现象、王蒙现象、余秋雨现象、易中天现象……可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坛的一大会景观。为什么在诸多名家中,上述那些文人会引起文坛高度聚焦而成为一种“现象”?那是因为他们的“所为”在公共领域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和争议,正反双方都拥有着相当的拥趸。这就显得十分沉重了,表明他们的“所为”——思想、言论、文章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能不引起我们高度关切吗?

在所有的“名家现象”中,当数余秋雨和易中天两大现象最为闹猛。因为它们借助了电视传媒,便逸出了狭隘的文化界从而掀动了整个社会,使芸芸众生都怀着极大的兴趣想弄明白其中的“究竟”。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众多的争议中却存在着大量“失焦”现象,使读者感到困惑不已。比如余秋雨,他本人并不以散文家自居,而自认是肩负着“重建文化心理秩序”伟大使命的文化学家。因此,他的文化理念才是他对社会的重大贡献。他的散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文化感和文化言说上。

但批判他的文章却将矛头主要集中在他的散文文学性的不足上,如“硬伤”或“庸俗的乚气”等。这就使余秋雨能够理直气壮地宣称,他根本弄不明白众多的批评在说些什么:“我虽认真地思索过,但是他们到底要指出我哪儿不对,他们到底不满意我的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余秋雨《寻找文化的尊严》第129页)所以,他根本不屑于理会。

人总不能保证毫无疏漏,因此对于散文中偶然出现的“硬伤”,没有苛求的必要。但作为如余秋雨那样颇负盛名的作家,其“屡屡”出现“硬伤”,有些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如五四白话文运动期间,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串同刘半农演的那场有名的“双簧”,余秋雨却将其说成是刘半农化名王敬轩同林纾开玩笑——那确实贻笑大方。但从文体的审美角度去评价的话,我们应该承认余秋雨的散文不失为上乘之作。“硬伤”之类的缺失并没有触及他的文化理念,所以余秋雨仍能很自在到处指点文化。

余秋雨的文化理念中涉及言论等级制、精英淘汰制、知识分子应“生活在别处”“天人合约论”等这些观点的,才是引发争议的真正焦点。我们对此不能回避。

关于易中天现象,情况亦颇为类似。

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开讲《品三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由此亦引来了如潮的非议。

有知名的美学教授讥讽易中天,作为厦门大学颇有声望的美学教授,竟不惜自降身段,甘以市井评话艺人的姿态和手法来取悦于俗众。

对此,我却要为易教授鸣不平。虽然易中天为了讲说生动,不时出现调侃过当的纰漏,但这毕竟仅属于瑕疵,就方向性来说,我认为他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易中天通过品评历史人物向社会大众灌输的某些历史观的确值得商榷。

“论说”面向大众是 21 世纪必须贯彻的重点工程(文化),能为公众所分享的学术成果才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教授的影响应逾越狭隘的校园,电视传媒应成为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紧密联系的最好的纽带。因此,在“百家讲坛”能受群众欢迎的教授应该被认为是好教授、优秀的学者。但在公共空间,面对着数以百万计的社会群众,影响之巨大,应使所有上电视的名家们心存足够的敬畏——功德无量的是群众能分享到文明的果实;若借此宣扬不当的文史观,那责任可够大的!

综上,在我们文化现代化的征途上,对那些存在争议的突出的文化观点,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目 录

余秋雨卷	1
言论自由会淘汰精英吗？	3
作家为什么会失去原创力？	14
贵族心态	27
质疑余版的“生活在别处”	38
论余秋雨的“天人合约”	47
中庸之道将是 21 世纪的最佳哲学？	56
文化痼疾与假冒伪劣	67
转型期需召唤怎样的文化人格	75
文化遗产怎能以文化偶像来传承	86
透视第三种人	98
一个王朝的阳谋	112
 易中天卷	 129
也谈易中天的“历史同情论”	131
为空想而奋斗的政治伦理应予否定	147
奸雄史观可以休矣	157
狷介之士绝非混蛋	173
不要将最丑陋的人看作是最聪明的人	181

“认死理”精神值得提倡吗？	190
如此盘点，焉能清仓	
——评易中天《盘点李泽厚》	201
“道德沙尘暴”异议	213
“非典型腐败”要由老百姓买单？	222
易中天的“费厄泼赖”且慢实行	232
易教授，请慎举“黄牌”	241
走出易中天的“迷宫”	251



余秋雨卷

■ 言论自由会淘汰精英吗？

“清官淘汰制”，这是吴思先生在深研明朝官场生态后发现的一条“潜规则”：清官在封建王朝是无法存在的，只有贪官才能站得稳、跨得开。由于清官必然被淘汰，于是官场上存在的尽是些贪官、昏官、瘟官……可以说简直没有一个好东西。这样的社会当然不会有前途，所以腐朽的封建制度终于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

余秋雨看到当下的文化生态呈现出一种“良莠不齐的发言混杂在一起，高低不一的智能胶着成一团”的状态（余秋雨《问学余秋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以下简称《问学》）而感到深切的忧虑。他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反常的现象。任由这种现象漫无节制地发展下去，将导致一个严重后果，“那一定是精英被淘汰”。（《问学》第44页）精英是民族中的优秀分子。国家建设、社会文明，很大程度上得仰仗这些优秀分子所起的先锋和骨干作用来推动。精英被淘汰，领袖的位子岂不全被庸人和落后者充塞了吗？那我们还怎能期待早日赶上世界先进，成功地建成一个现代文明国家？

余秋雨还深入地为我们找出了“精英淘汰”的根由，那就是

“言论自由”。因为讲自由,取消了必要的限制,所以良莠不齐、级别悬殊的言论都被允许同时公之于众,那结果——余秋雨痛心疾首地断言——“一定是精英被淘汰,这种现象叫精英淘汰制。”

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关注了。因为人们都认为人民革命的两大目标就是民主和自由。改革开放也就是要在这两方面做得更好。言论自由已成为我们社会制度的一种显规则。而现在余秋雨却发现言论自由竟在制造淘汰精英的效应,那它对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危害就太大了。显规则不同于潜规则。潜规则,如“清官淘汰制”,虽然被人们无奈地容忍、习惯地顺从着,从而主宰了整个官场,但它毕竟有悖于社会的法制(即使是封建王朝,也明令禁止贪赃枉法),并不那么理直气壮,因此只能在台面下悄悄地运作,这就使得它的效应存在一定局限性。而显规则却完全没有类似的顾忌,因为它有赖于法制方面的有力支持,所以可以畅通无阻,其影响也就远非潜规则所能比肩。因此,显规则是不能允许产生负面作用的,一经发现,就当立即加以修正。再不,那就干脆予以废除,以免社会文明因此而受到损害。

那么,究竟当下的言论自由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让余秋雨认为这最终导致了精英日渐被淘汰?

余秋雨认为根由就在于现时人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有误。由于不恰当地强调自由没有“度”的限制,全然抹杀人在自然属性上存在着智能的差异,以及社会属性上有着学识和教养方面的高低不同,结果便形成一种纯粹的平等理念,不作区分地将精英和社会大众放在同一层面上来对待,根本上失却对精英等

级的尊重和维护。不知道“大量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很难在学术文化上与大学教授对话。但是这些常识性的社会区隔，在今天常常会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被取消，造成一片混乱……”（《问学》第43页）

将精英们高质量的言论，淹没在一片广场式的喧嚣中，精英们会受到有力的排挤，被压缩得日益委顿下去，最终被无情地淘汰。这就是为什么当今公共空间不时出现热闹的“争鸣”场面，但结果却发现，除了一时的泡沫外，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先秦的百家争鸣却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开创出了一个新世纪。历史的启示已足够清晰地表明：“百家争鸣是应该经过严格选择的高等级的发言，而今天媒体间的发言却没有这种选择。”（《问学》第43页）

在余秋雨看来，当下的言论自由只不过是一种狂欢式的卡拉OK，不能期待它会促进学术思想上的繁荣和进步。由此，他严正地提出：

今后，国民素质的提高，应该表现在大家对于精神等级的承认、梳理和守护，表现在大家对于高层思考者的尊重、保护和礼让上……那么，一个新文化的黄金时代将降临人间。

（《问学》第45页）

余秋雨的论点到底有多少合理性？

精英——高层思考者——由于他们真诚地关注社会正义，不遗余力地为促进社会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是应该得到

人们高度尊重的。是否尊重精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的文明标志。一个不知道尊重高层思考者的社会是野蛮的、落后的,这样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

在应尊重高层思考者这一点上,似乎没有人与余秋雨有不同的意见。当今社会并没有呈现任何鄙视或者否认高层思考者的现象;倒是相反,由于人们对精英过于尊重,不时将他们推升至“大师”的宝座,以至当今中国“大师”之多,足可雄视全球,可见人们对高层思考者是何等地热情和爱戴了。

至于余秋雨责难当今媒体不作严格选择,就将等级差距很大的言论,不加区隔地放在同一空间进行对话,表现出对高层思维缺乏尊重的说法,也同样不符实际。

社会应该尊重高层思考者,但我并不认同以余秋雨所提议的方式来表达对他们的尊重。

他要求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将精英予以等级化,来体现出对他们的尊重和守护,其观点大致可归纳如下:

一、我们应该承认精神等级的存在——精神等级的差距体现着言论质量的高低,因此应按言者的精神等级将他们明显地区隔开来。媒体不应使他们的话语混杂在同一空间。

二、对话是精神交流和驳难的一种体现,因此只能在相应的精神等级之间进行。媒体必须有效阻截高分贝的杂音,避免向高层思考者挑起无谓的争论。

三、需要建立按精神等级来甄别言论质量的选择机制。由于当下的媒体缺乏这一机制,结果“任何人在任何空间都可以任意放言”,这才产生良莠不齐的言论混战现象。这种无序的言论自由,是对高层思考者的最大亵渎。

等级制是封建社会最显著的特征。虽然现代社会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等级现象,但它与封建社会已有本质上的不同。不过在现阶段,在人类文明尚未找到更先进、更合理的方法前,等级现象却不得不承续下来。比如,等级所显示的人际的权力关系:上级对下级有支配的权利;下级对上级有服从的义务,否则社会就无从组织起来,不能发挥出有效的行动力量。但人与人之间由权力链联结起来,总是有违人性的,所以民主社会将它严格限定在行政(广义)领域中。而余秋雨现在却要求将它延伸、扩展到媒体领域。

媒体领域,也就是公共领域,它完全不同于任何专业领域。后者属于少数专家,他们所面对的是特定专业上的具体问题。等级在专业领域中显示了专家应对专业方面具体问题的水平,以及所能承担责任的大小。而公共领域是面向大众的。它关注的是公众的切身利益,所涉及的是有关社会正义和社会文明等问题,所以专业领域中的等级标准,并不能体现专家精英们在应对社会大众切身问题以及社会正义等问题时必然具有的相应水平。高级精英的公共言论,未必就是高质量的,甚至往往根本就是错误的,所以对待在媒体上的公共言论,决不能从言者的身份等级高低来判定它的质量。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就是杨度,人称“旷世奇才”,是清末民初最为渊博的宪政专家、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是民国初期毋庸置疑的“高层思考者”。但他竭力鼓吹“君主宪政”,拥护袁世凯称帝,发表名文《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大造舆论。还有筹安会第二大台柱严复,也是当时名重一时的学者。他是我国翻译事业的开拓者。他所翻译的世界名著赫胥黎的《天演论》,当时不知影响了多少

爱国青年,他一时被文化界尊为我国的启蒙思想家。像这样一位中西贯通、视野开阔的高层次精英,按理应该清楚了解世界潮流的大方向,中国怎么能再退回到帝制的老路上去,那岂不是走向坟墓?但两位“大师”——杨度和严复——竟沆瀣一气,为上演“洪宪帝制”,在媒体上大肆鼓噪。如此言论,世人能视之为高质量吗?

另外,还因为人的思想不仅是有限的,且又是多变的,随着生存空间的转换,人的品质和意识也会发生极大的变化。人一旦荣登了高位,思想也就受“屁股”即“座位”支配,言论就必然地会越来越“偶像化”。因此,余秋雨要求媒体用等级来区隔言论空间,那将会形成一种牵制社会前进的机制。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人物,确实睿智卓识,勇于作为,曾为伸张社会正义作出过很大贡献,一时众望所归,人皆尊之为社会栋梁、人群中的高级精英。但却经不起时间无情修理,由于不断自我异化,最终日益堕落。要是人们囿于等级观念,仍以高层次精英来仰视他们的言行,不敢心存异议予以驳难的话,那公共领域就将被他们那些腐朽的言论污染。比如汪精卫这个人,在他的前半生,从学识、资历等各个方面,国人无不认同他是中国少有的精英。他青年时代投身反清革命运动,英勇行刺摄政王的壮烈行为,连清朝统治者都对之钦佩。他颇具国学才能,在起草孙中山临终遗嘱时,竟能使孙中山满意到不更动一个字。孙中山死后,他挑起了领导国民党的重任,并担任过政府最高行政首长——行政院长。因此,说他是一个高层精英绝不为过。但就是这样一个高层次的精英,在严峻的抗日形势下,却神志迷乱起来,不断地散布悲观、沦亡的言论,最后竟堕

落成出卖民族利益的大汉奸。倘若按余秋雨的等级观点，像这类关系到整个民族存亡的大问题，应该由高层思考者去探索、去对话，怎能容忍常人直接与高层次精英对话？不过历史却有力地否定了余秋雨的观点，当时正是广大爱国人士在舆论上对汪精卫等所谓精英的谬论痛加驳斥，在政治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压力，迫使国民政府在1937年进行全面抗战，这才使中华民族免于沦亡的结局。

但是余秋雨认为，等级悬殊的对话、良莠不齐的言论混杂在一起吵吵嚷嚷，这种无序的争鸣，绝不可能争出什么真理来。而笔者的看法却与此截然相反，这种无序的争鸣，才是发现真理的最佳途径。

以上笔者论述公共领域的实质，就是为了概要地说明，那是一个关系到众人利益和社会正义问题的空间，所以它是极其复杂、无限多面的有机体。个人只是有限体，没有人能穷尽问题的全部，无论是多高层次的思考者，即使是圣人、伟人、哲人……也只能看到有限的局部。因此，只有在看似无序的纷乱中，让人从各个层面、各种角度提出质疑和驳难，鼓励具有不同视野的人相互间进行正面交锋，才能克服局限、淘汰谬误，最后获得较完善的结论。

余秋雨责难言论自由曾引起过“考教授”运动，有人拿了《小学生词典》来揭露国学大师语文基础知识的匮乏。他本人前几年也遇到类似问题：“一个文化等级不高的人也用‘揭露’式的气势，硬要与我讨论他非常不熟悉的古典词语问题、地理历史问题，甚至戏曲史问题，全国一百多家报纸转载报道，港台方面也热闹了一阵，我却无言以对。因为一旦与他‘讨论’起